

《历史研究》 五十年论文选

(理论与方法·上)

《历史研究》编辑部/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历史研究》五十年论文选

(理论与方法·上)

《历史研究》编辑部 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本丛书得到香港金城营造王锦辉
慈善教育基金会资助，谨此致谢！

序 言

王 和

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曾被中国史学工作者划分为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三个部分，三者合称史学理论。近年来，又有学者将涉及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划分为“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两个部分，前者包括过去所说本体论的内容，后者则较旧有“史学理论”的内容大为缩减，仅包括过去所说认识论与方法论的内容。尽管近年来赞同后一种划分的学者渐多，实则这两种分法各有优劣：因为实际上就严格的定义来讲，“历史理论”与“本体论”一样，使用于此都是具有相对模糊性的概念。但同时对于史学工作者而言，其内涵和外延又都是清晰的：目下流行的所谓“历史理论”或过去所说“本体论”，实际皆指史学工作者对于历史本身的思考；而目下流行的所谓“史学理论”或过去所说“认识论与方法论”，则主要是指史学工作者对于历史学和历史学家的思考。

本卷仍然沿用过去的分法，分为上下两册：上册收入涉及“本体论”亦即“历史理论”的内容，下册收入涉及“认识论与方法论”亦即“史学理论”的内容。

一

上册“本体论研究”，内容丰富。其荦荦大者，主要包括中

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中国封建社会的典型性与长期延续原因问题，农民起义与农民战争问题，资本主义萌芽与起源理论问题，历史创造者和历史动力问题，历史规律问题，等等。其中的每一个问题，都在上个世纪下半叶的一定时段之内，在中国史学界引起过激烈的争论，牵动过每一位史学工作者的神经。它们不但对中国史学的发展影响至深，有的且与当时的政治形势紧密相连，对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和作用；有些问题的影响与作用还一直延续到今天，并仍然具有鲜活的生命力。

从这个意义上讲，本册的内容无异是中国史学在这一历史时期所走历程的缩影。重读这些文章，可以清晰地体验中国史学半个世纪以来的发展脉络。

就学术史的角度而言，本册收入的论文凝聚着几代学人的心血，展示出深具时代特色的中国史学的理论建树与风采。由今天的眼光看，其中固然不乏至今仍被认同和具有魅力的杰出成果，但更多的却是已经“淡出历史”的内容。它们向今人揭示着“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学问”的真实与残酷，也促使今天的学人更深入地思考薪火传承与学术积累的意义问题。

因此，对于年青一代的史学工作者来说，虽然本册的一些内容在今天的实际历史研究中仍然具有现实的指导或启迪意义，如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理论问题和历史创造者与历史动力问题的讨论即是如此；其他一些问题今后无疑也仍然存在进一步讨论的意义和空间。但毋庸讳言的是，其中更多的内容，对于今天的他们来讲都已十分陌生。当时曾被视为具有重大意义的很多问题，除了从事史学史研究的学者之外，在今天的现实中已不再为人所关注；同样，当时的很多结论除了史学史的意义之外，今天也已不再被人们所认同。星移斗转，风物变迁，当一个社会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发生巨变之后，问题意识自然完全不同了。

由此而使人想起 19 世纪杰出的英国学者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在《论自由》中所说的名言：

每个时代都有很多种看法，在随后的时代不仅会被认为是错误的，而且简直就是荒唐的；同样，有很多如今被人们普遍接受的想法，以后将会遭到拒斥；也有很多过去被人广泛接受的想法，却遭今人抛弃。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所揭示的是认识论的一个规律，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任何力量都扭转不了。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这一点。

相信当青年一代史学工作者今天重温这些内容的时候，一方面不难深切地感受到前辈学者们当时的执着和投入，且会情不自禁地被其中所闪现的理性智慧与思想火花所吸引和感动；另一方面，一种混杂着惊异、遗憾、痛惜和欣慰的复杂感受会涌上心头，且于掩卷之余，会自然而然地发出“历史何以如此”的提问和深思。

历史何以如此？面对这样一个问题，从贝奈戴托·克罗齐、爱德华·卡尔、柯林伍德的时代直至今天，学者提供过很多答案，今天的史学工作者多已耳熟能详。其中对我们最具启发意义的，也许还是克罗齐那句言简意赅的论述：“任何真历史都是当代史”。它告诉我们：历史学家总是、而且只能是从现实出发，受现实所制约，依据现实的条件及面临的问题去认识历史。对于后代的史学工作者，重要的是了解当时的人们为什么要研究这些问题，以及怎样研究这些问题。

从这个意义来说，本册的内容不但是中国历史学在那一历史时期所历程的缩影，反映着中国史学半个世纪以来走过的发展道路；同时也是那段逝去岁月的总体时代掠影，体现着国家和民族跳动的脉搏。

二

相对于上册“本体论研究”，下册“认识论与方法论研究”的内容显然更贴近今天的现实。其中收录的论文除少数几篇外，都发表于80年代以后。

从世界历史范围看，历史学由19世纪发展到20世纪，一个最具深远影响和决定意义的变化，是从过去那种思辨的历史学，发展为分析、批判的历史学，即由对于历史本身的探讨，发展为对于历史学和历史学家的研究。在这种变化之中，对于历史学的学科发展最具突破性意义的，就是史学工作者对于历史认识的主客体关系的思考。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史学工作者已经感受到这种变化并参与其中，我们从王国维、梁启超、胡适、张荫麟、顾颉刚等前辈大师们的有关论述中不难体会到这一点。

但是，当历史进入到20世纪50年代以后，历史学这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变化，在中国史学界曾经一度中辍，这种中辍在实际上导致了历史学学科发展的停滞和倒退，其原因众所周知。当时的史学工作者一致遵循的“从客观的历史实际出发”这一准则，使历史认识论的水平重新倒退回兰克学派以前。

从本卷收录的有关论文可以看出，中国史学工作者对于这一问题的重新认识，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伴随着改革开放时代的到来而开始的。特别是在80年代的中后期，史学界对于历史认识论中主客体关系问题的讨论一度十分热烈，其达到的深度至今未被超越。广大的史学工作者，特别是从事理论研究的史学工作者，从这场讨论以及其后的持续发展中获益极大，这主要体现在两点：一是完成了与20世纪上半叶被打断的史学理论发展过程的接续，一是达到了与现代世界历史学发展水平的对话和接轨。

除了涉及主客体关系问题的内容外，本册还收入了其他属于史学认识论与方法论的内容。其中特别值得向读者推荐的，是一

组论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文章。人们不难看出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史学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理解上的深入，以及他们为使唯物史观与时俱进而进行的可贵探索。

作为那个时代鲜明特点的一个代表，我们从 50 年代众多的批判文章及后来的评价性文章中，选取了关于评价胡适史学思想的一组文章，以说明那个时代的特殊氛围和改革开放以来所发生的改变。由 20 世纪 50 年代的“批判胡适的多元历史观”，到 80 年代的“评胡适的历史学成就及其理论方法”，再到 90 年代的“批判的历史精神——胡适历史哲学思想初探”，仅仅是这些不同的题目——从“批判胡适”到肯定胡适史学思想的“批判精神”，便既体现出半个世纪以来不同时期中国学术环境的不同特点，也清晰地反映了改革开放以后时代的发展对于历史学的良性影响，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变化。

本册的内容还包括其他一些关于史学认识论与方法论的文章，兹不一一说明。

由于实际划分的困难，本册收入的有些文章中不可避免地包含有涉及本体论的内容，关于论述五种生产方式理论形成过程与再评价的一组论文即是如此。

三

简略谈几点感想。

(一) 如何认识唯物史观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人类对于自身历史认识的科学总结。中国的史学工作者之所以笃信唯物史观，是由于相信它是真理；而之所以相信它是真理，是因为它能够解决实际问题。在今天的中国史学界，不管我们情愿或承认与否，唯物史观已经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事实证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人类对于其他所有

事物的认识一样，必须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否则便将失去生命力。如何使唯物史观不但能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并且仍然能够站在时代的前面对现实的史学研究发挥指导作用，是一切真正关心唯物史观命运的人必须认真对待并努力探讨的问题。

（二）如何认识理论在史学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

历史学自身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理论更新既是史学发展的标志，也是史学进步的真正体现。自改革开放以来至今，中国历史学经历了由热衷于理论探讨到忽视理论再到重新表现出对理论的兴趣这样一个耐人寻味的过程，它反映了中国史学在这段特殊时期的有趣变化。

从学术发展的规律来看，每当具体的研究成果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都会激发起学者对于理论问题的重新审视。一般来讲，在具体的研究课题中卓有成效的学者，大多会逐渐拓宽自己的研究领域，而当这种研究领域拓宽到一定程度和范围的时候，原本不为自己所关注的一些宏观的理论就会自然地进入视野。

近两年来，一些处于学术前沿的、在具体的研究领域中成果显著的史学工作者，开始表现出对于理论问题的明显兴趣。这些学者之中，不少人本来对理论问题是不感兴趣的。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变化，可能预示着中国史学在理论上会有新的突破。

（三）关于学术积累与传承问题的启示

从20世纪的开端至上半叶，梁启超提出了“未来之真史家”必须具备运用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法学、伦理学等众多相关学科研究历史的能力的预测，胡适与张荫麟提出了历史学“既是科学也是艺术”的论断，顾颉刚提出了“层累地构造的历史”和“不立一真唯穷流变”的著名认识。这些深具远见卓识的理论与方法，是前辈大师们留下的宝贵遗产，至今具有魅力，并为今

天的广大史学工作者所遵从和运用，实际上也与“后现代”理论中所蕴含的合理成分一脉相承。

这一事实不但告诉我们：就史学发展的大时段而言，我们今天与 20 世纪初叶仍然处于同一历史时期之内；同时也促使我们用更宽阔的眼光去认识学术的积累与传承问题。何以有些学问能够具有为后代所传承的价值，而有些学问则成为转瞬即逝的一时之学？相信今天的史学工作者经过认真思考之后，会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

2004 年 10 月

目 录

与范文澜同志论划分中国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 标准问题	吴大琨 / 1
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的关键何在?	日 知 / 15
中国古代史分期商榷(上)	金景芳 / 33
中国古代史分期商榷(下)	金景芳 / 48
怎样理解郭沫若同志的古代史分期学说 ——兼评金景芳先生的《中国古代史分期商榷》	侯绍庄 / 70
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分歧的原因何在?	王思治 / 93
关于奴隶制几个基本理论问题的商讨	沈长云 / 108
中国社会形态及相关理论问题学术研讨会 述评	张分田 张荣明 执笔 / 123
论中国古史的氏族时代 ——应用长时段理论的一个考察	晁福林 / 150
中西封建专制制度的比较研究	庞卓恒 / 170
试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	刘 昶 / 187
中国封建社会的典型性与长期延续原因	刘修明 / 208

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农民革命战争问题的讨论	史绍宾 / 224
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性质的商榷	白寿彝 / 236
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因素的萌芽及其增长	尚 钺 / 249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考察	黎 澍 / 306
对黎澍同志《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考察》 一文的几点意见	韩大成 / 345
资本主义起源理论问题的检讨	马克垚 / 369
英国模式、江南道路与资本主义萌芽	李伯重 / 390
略论历史发展的伟大动力与终极原因的 内在联系	罗荣渠 / 410
论历史的创造及其他	黎 澍 / 432
关于《论历史的创造及其他》的信 ——致黎澍同志	吴 江 / 448
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兼与黎澍同志商榷	郭瑞祥 / 454
历史的创造者和创造历史的动力 ——答祝伟坡同志	黎 澍 / 468
关于历史创造者问题的讨论	徐思彦 整理 / 474
说“合力”	刘大年 / 481
“合力”辨 ——兼与刘大年同志商榷	吴廷嘉 / 490
《说“合力”》质疑	陈孔立 施伟青 / 507
“终极原因”与“相互作用”	李振宏 / 515
试论历史规律	王 和 周 舵 / 539

社会形态与历史规律再认识笔谈	何兆武等 / 565
开展历史研究, 迎接文化建设高潮	
——为《历史研究》发刊而作	郭沫若 / 607
提倡不同学派平等地讨论问题	本刊评论员 / 612
批判胡适的多元历史观	嵇文甫 / 617
评胡适的历史学成就及其理论和方法	耿云志 / 627
批判的历史精神	
——胡适历史哲学思想初探	闻继宁 / 651
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	宁可 / 669
有关历史人物评价的几个问题	尚 钺 / 728
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学的要求	黎 澍 / 776
当代中国史学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发展	
.....	蒋大椿 / 794
弘扬唯物史观的科学理性	
——与蒋大椿先生商榷	吴 英 庞卓恒 / 830
什么是历史科学理论	
——历史科学理论学科建设探讨之一	宁可 / 868
历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	庞卓恒 / 880
要重视和加强史学方法论研究	吴廷嘉 / 897
史学理论的层次模式和史学多元化	李开元 / 914
论历史研究的对象	刘大年 / 929
历史认识的相对性	赵轶峰 / 961
历史认识对象的特点	王正平 / 978
论史家主体意识	李振宏 / 992

论史学主体认识的一致性	李 林 / 1018
当代历史认识论的反省与重建	赵吉惠 / 1039
关于历史认识论的几点思考	张耕华 / 1059
历史认识：主体意识和主体的创造性	于 沛 / 1081
再评五种生产方式说	胡钟达 / 1097
论五种生产方式理论的形成	项观奇 / 1125
马克思的社会形态更替理论是科学假说	朱本源 / 1147
论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	罗荣渠 / 1172
20 世纪的西方史学与当前的新取向 ——兼论中国史学的优势及前景	马雪萍 / 1199
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	王明珂 / 1222
编后记	/ 1245

与范文澜同志论划分中国奴隶 社会与封建社会的标准问题

吴大琨

在国内的历史学界，现在有好些同志认为我们要决定中国的西周或西周以后的社会究竟是封建社会，或者不是封建社会问题的主要的关键是在史料上。

我认为这看法是不正确的，当然为了能正确而详尽地说明历史，史料总是越多越好的，但如果我们不能正确地根据历史唯物主义来说明这些史料，即使史料无限量地堆积起来，也还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范文澜同志的《中国通史简编》是主张西周即是“封建社会”的。在这个著作中虽然引用了一些史料，但是范文澜同志所据以得出“结论”——西周是封建社会的“结论”——来的“理论”，他对于划分“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标准等问题上，我认为是存在着严重的理论问题的。

范文澜同志在《中国通史简编》一书中，对于为什么西周是“封建社会”这个问题的答案，事实上是并不具体而充实的。

他在《中国通史简编》的第三章中，一开头就说：“周国出现了新的生产关系。”可是究竟这种“新的生产关系”，是怎样的

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呢？它是建立在一种什么新的生产力状况上面的呢？范文澜同志并没有交代。由于范文澜同志根本没有说出西周与殷之间，究竟有什么划时代（即划分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不同的生产力状况来，因此范文澜同志所指出的所谓“新的生产关系”也就变得缺乏了根据。

范文澜同志在这一著作中提出的惟一根据，是《诗经》里面的几首诗。他说：

从《诗经》叙述文王及西周初年事的诗篇里看来，当时确已实行着封建制度。例如《灵台》篇说文王要筑高台，庶民像儿子替父亲做事那样踊跃，很快就筑成（“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经始勿亟，庶民子来”），这很不像是奴隶替奴隶主服役的景象。《召南·行露》（“虽速我讼，亦不汝从”）、《摽有梅》（“求我庶士，迨其吉兮”）、《野有死麇》（“有女怀春，吉士诱之”）等篇，说民间婚姻事，并无奴隶主指配婚姻的形迹。《东山篇》叙述周公东征三年，兵士们归来的情形。诗中第二章描写兵士们想念他们荒凉冷落的小农村，说：“不可畏也，伊可怀也。”第三章描写兵士想念妻子，知道妻子也在想念他，第四章描写兵士归家新婚的欢乐。对这个荒村留恋不舍的人，应该是附着在土地上的农奴，要说成奴隶是很难的。^①

我也同意范文澜同志要把《诗经》中所说及的这些人“说成奴隶是很难的”。但要把他们说成是“农奴”，恐怕也还是同样很难的。奴隶们固然不会像儿子替父亲做事那样踊跃地去为奴隶主服役，可是“农奴”恐怕也一定同样地不会那样踊跃地去为农奴主

^① 范文澜著：《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编页五四，一九五三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以下简称《通史简编》）。

服役的。而且，我们有什么理由可以设想，这些诗里的人不是“奴隶”就一定非是“农奴”不可呢？把他们解释成是当时尚未完全解体的“氏族公社”里的农民，不是要更恰当一些么？

中国在古代文献里所说到“佃民”或是“庶人”，都绝大多数不是奴隶而是农民这一点，我想是不可争的事实，但这些农民也并不都是“农奴”。如《左传》说：“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上思利民忠也……”（桓六年），足见“民”不是“农奴”，否则“忠于民”的话便不可通。又如《左传》说：“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襄十四年）这里的“民”也不能解释成“农奴”。^①于此可见，《诗经》里所说的农民不是“奴隶”是一件事，但他是否就是“农奴”，是另外一件事，是不能混为一谈的。

在这里，我们同时要说明的，就是《诗经》里的农民，虽然不是“奴隶”，也不能证明西周就不是奴隶社会。

因为近十多年来，由于某些苏联历史学者的努力，已经证明了过去马克思的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就是古代东方奴隶制的生产方式，但这种古代东方奴隶制的生产方式是一种奴隶社会的低级阶段，所以在这种社会里的奴隶数量是比较地不大的，作为这种社会的主要劳动者的，因此，也不是“奴隶”而是“公社”的成员，是自由民。^②

在范文澜同志的概念中，似乎一说到“奴隶社会”就一定非是指典型的希腊、罗马的奴隶社会不可，所以一看到一个社会中的生产者不是奴隶，就立刻把非奴隶的公社“农民”，判断成为“农奴”。我们认为：范文澜同志至少应该承认这些《诗经》里的农民是有可能不是“农奴”的，从而，西周也有可能不是封建社

① 董丕绳：《关于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的问题》，《文史哲》一九五二年九月号。

② 日知：《与童书业先生论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文史哲》一九五二年三月号。